

# 卡拉扬的中国之旅

文\本刊特约撰稿 王凯

## 卡拉扬其人

对于全世界古典音乐爱好者来说,卡拉扬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也是一个传说般的存在。

卡拉扬出生在奥地利一个贵族家庭,父亲是一位医生,也是一名音乐爱好者,经常在当地演出。卡拉扬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耳濡目染,从小便对音乐情有独钟。卡拉扬的出生地萨尔茨堡是音乐天才莫扎特的故乡,这里有一所以莫扎特名字命名的音乐学校,卡拉扬从小便在这里学习,得到了极为系统、正规的音乐训练。

从莫扎特音乐学校毕业后,卡拉扬来到音乐之都维也纳,先后在维也纳国立音乐学院和维也纳大学学习钢琴、指挥和音乐学。起初卡拉扬是主攻钢琴的,后来由于手指出了问题,才将指挥作为自己的主要专业。在校期间,卡拉扬第一次登上了舞台,他指挥学生管弦乐队演奏了一首世界名曲,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好评,卡拉扬也第一次尝到了成功的滋味。

大学毕业后,卡拉扬回到了出生地萨尔茨堡。卡拉扬在当地知名度很高,也有着熟悉的朋友和人脉资源。在父母和朋友帮助下,卡拉扬开始策划、准备自己的音乐会,不久他便指挥自己的母校莫扎特音乐学校学生乐队,演出了柴科夫斯基的《e小调第五交响曲》、莫扎特的《A大调钢琴协奏曲》和理查·施特劳斯的交响诗《唐璜》。这是一场水平很高的音乐会,卡拉扬不仅赢得了现场观众的心,而且还征服了乌姆市歌剧院的院长。院长听了音乐会后,马上聘请卡拉扬担任歌剧院的常任指挥,这是卡拉扬的第一份指挥职业。

卡拉扬在乌姆市歌剧院待了整整5年,他带领乐队先后演出了莫扎特《费加罗的婚礼》、瓦格纳《纽伦堡的名歌手》和理查·施特劳斯的《莎乐美》等大型作品,让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乌姆市歌剧院大放异彩。卡拉扬以此为起点,逐渐走上了音乐的巅峰,成为了指挥界的神话和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指挥大师。

## 卡拉扬来北京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古老的中国重新焕发了青春,实行改革开放敞开了国门。1979年,先后有十几家国外知名乐团来华演出或者教学,久违了的世界名曲重新回荡在中华大地。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艺术的春天已经来临。

在这种背景下,已经71岁的卡拉扬率德国柏林爱乐乐团来到了北京。根据中国政府与联邦德国(当时德国还未统一)政府签订的文化交流协定,柏林爱乐乐团在北京举行三场音乐会,其中两场由爱乐乐团演奏,最后一场由中国中央乐团与爱乐乐团联合演出。限于当时的条件,音乐会不公开对外售票,而是由国务院文化部统一安排全国各地艺术院校和文艺团体的专业人士到京观摩。

文化部成立了以中国对外演出公司副经理党允武为组长的接待小组,

具体负责卡拉扬来华演出事宜。接待组首先遇到的是住宿问题,按照文化部要求,乐团首席指挥卡拉扬、行政经理吉尔特和其他8名主要成员入驻北京饭店,每人或者每对夫妇安排一个单间,其余200多人均安排前门饭店双人间。前门饭店没有问题,但北京饭店的房间却一直没有落实。北京饭店是当时为数不多接待外宾的高档酒店之一,床位非常紧张。党允武一次去沟通、解释,说卡拉扬不仅是西方有名的大指挥家,还是中央请来的客人,地位和待遇不亚于普通国家的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但北京饭店就是不买账,后来还是有关领导发了话,才安排了房间——这时已经是10月27日下午16时了,而当天晚上卡拉扬他们就抵达北京。

接待组遇到的第二个问题非常麻烦,晚上19点半,爱乐乐团搭乘美国麦道DC-10型客机到达首都机场。由于首都机场原来没有接待过这么高大的飞机,没有合适的舷梯使用。接待组马上与机场沟通,让工人立即改装,在原有舷梯上钉上几块木板,这样就可以凑合着用了。

但天有不测风云,当卡拉扬等乐团主要人物来到机场贵宾室,文化部分管外事的副部长与他们握手寒暄时,突然有人进来说出事了。原来乐团人多,下来不到一半舷梯就坏了,有两位乐队成员没有注意,从飞机上掉了下来,造成多处骨折;走在前面的另一位乐队成员受了惊吓,心脏病当场发作。据在场的翻译回忆,卡拉扬听了汇报后很不高兴,一言不发便去看望伤员了,让在场的中方陪同人员十分尴尬。

28日上午,爱乐乐团在首都体育馆进行演出前排练。据知情人回忆,当时有很多中国音乐爱好者在场内观看,这些人大都是文艺界人士,但也有一些家属和孩子,对观看音乐会的规矩和礼仪不太了解。当卡拉扬开始指挥排练时,观众中还有不少人大声说话、咳嗽,甚至吐痰。卡拉扬大为恼火,转过身来面向观众,一言不发,现场这才安静下来。事后卡拉扬质问中方接待人员,为什么排练现场这么多人看演出,乱糟糟的,还有人来回走动?接待人员也不好意思,只好含含糊糊地回答说,这是按照事先双方签订的协议执行的。好在卡拉扬没有深究,这才应付过去。

中方接待组接受了这个教训,正式演出时专门在体育馆张贴了观众注意事项,其中有这样一条:“为了保证演出效果,请同志们入场后要保持安静,馆内座椅在起坐时易发出响声,希望同志们起坐时扶好椅面轻坐轻起,以免发出响声。”

## 中国人记住了卡拉扬

1979年10月29日晚,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做了首场访华演出。

据当年的节目单记录,这一场演奏的曲目是莫扎特的降E大调第三十九交响曲和勃拉姆斯《c小调第一交响曲》。对于卡拉扬及乐团成员的表现,后来有一篇回忆文章这样写道:“卡拉扬对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的演

绎是那种抒情性与戏剧性兼备的综合体,演奏自始至终焕发着炙热如火的热情和美轮美奂的色彩。柏林爱乐的重奏组技艺高超,独步天下,特别是末乐章圆号吹出的阿尔卑斯牧牛调更是震人心魄,与清澈如水、音响清朗的弦乐、木管交织映辉,最后在卡拉扬的指挥棒下把乐曲推向高潮。”

第二天晚上,爱乐乐团举行了第二场演出。第二场的曲目是德沃夏克《G大调第八交响曲》和穆索尔斯基《展览会上的图画》;11月1日晚,中央乐团和爱乐乐团联合演奏了贝多芬的《降B大调第四交响曲》和《A大调第七交响曲》。演出获得了圆满成功,据参与者回忆,卡拉扬不拘一格的指挥艺术和爱乐乐团华丽绚烂的音乐彻底征服了中国观众,当时的场面称得上是如痴如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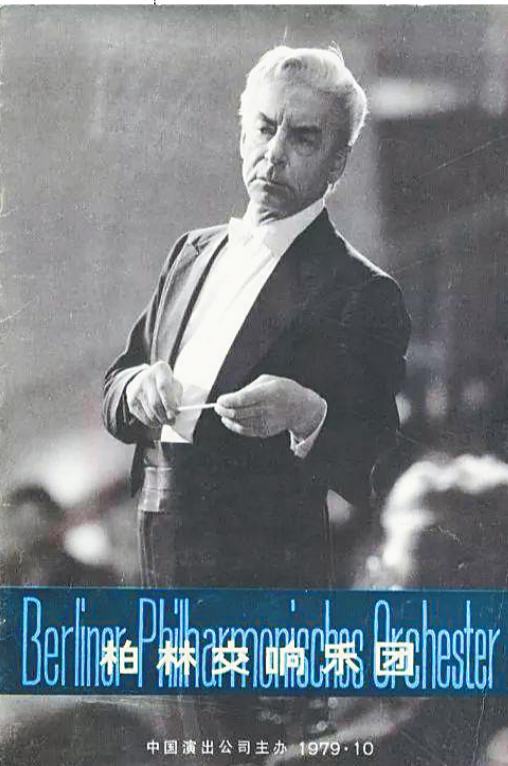
在演出后的庆祝宴会上,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一位青年学生为卡拉扬和爱乐乐团演奏了中国二胡名曲《二泉映月》,音乐都是相通的,卡拉扬听后眼里含着泪光,紧紧拥抱了这位青年学生:“棒极了,你的每一个乐句都是真正用心来演奏的。”后来卡拉扬邀请这位青年去奥地利学习小提琴,但他心里始终丢不下二胡,最后没有成行。

1979年的中国之旅是卡拉扬第一次来中国,也是最后一次。演出之余,他游览了故宫、天坛和北京的大街小巷,感受了别有情趣的东方文化。离开北京前,卡拉扬提出了几点希望,一是希望中国民乐团去柏林访问;二是希望中国派团参加萨尔茨堡音乐节;三是希望选派3至5名中国学生去奥地利音乐学院学习西洋乐器;四是希望能到北京故宫拍摄歌剧《图兰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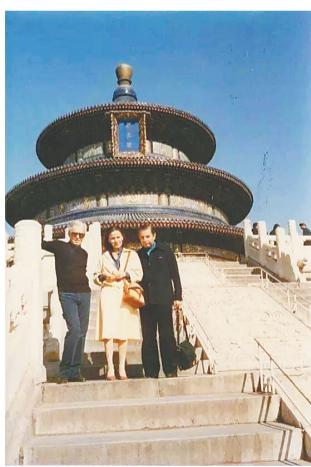
不知卡拉扬的希望最终有没有实现,但中国人却记住了这个严厉却不失诙谐的外国老头。1988年,中国导演张建亚拍摄了一部名为《绑架卡拉扬》的电影,说几个中国小青年得知卡拉扬要来中国演出后,为了得到演出门票,竟然策划“绑架”卡拉扬。故事虽然荒诞不稽,却道出了卡拉扬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



卡拉扬在萨尔茨堡的故居



卡拉扬在北京的演出海报



卡拉扬(左一)与朋友在天坛